

# 美國規劃教育之新趨勢

政治大學地政系副教授 徐世榮

時序漸近，二十一世紀新的年代即將呈現在我們的面前，由於時代的轉變，不同的社會問題逐一浮現，如何來面對未來的挑戰也就成為規劃學者注意及熱切討論的話題。美國規劃學會在一九九一年春季號文刊中，就有多位著名的學者在探討這個問題，討論之中，很自然的，如何來教育下一代的規劃者也就成為學者們關注的一個焦點 ( Susskind 1991 ); 無獨有偶，同樣的主題也再一次的成為美國規劃學會一九九三年春季號文刊的重點 ( Blakely and Sharpe 1993 )。本文研究的動機就是根源於上述期刊的探討，其要旨即是要討論美國規劃教育在過去幾十年來的走向及其最新的趨勢。本文嚐試由美國規劃教育過去的歷史成長背景，面臨的問題及其回應，及新趨勢等三部份來進行研究，由於主題甚為龐大，其疏忽之處必定難免，還望讀者諸君多所指數。然而，雖然本文標題為新趨勢，有趣的是，

所謂的新趨勢卻往往也就是舊話題的再度浮現，是學者之間針對不同的典範（paradigm）進行爭辯，這種現象目前仍在持續當中。

## 壹、時代背景

如同柏洛夫及柯雷特（Perloff and Klett 1974）所言，美國的規劃教育同時受到下述三項因素的影響：社會大環境的變遷、政府所施行的計畫、及規劃在實際上的應用情形。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都市化的現象迅速在美國展開，許多農家子弟及黑人大量湧進了城市，此刻都市內的活動也傾向於工業技術化，但是面對這種社會大環境的變遷，美國政府並沒有作出立即及強而有力的回應，政府所實行的社會計畫非常的有限，而規劃教育及規劃工作受此現象的影響，沒有得到社會的重視。

在1960年代，美國都市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如貧窮、種族歧視、環境品質惡化等。那時，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為學界提供了大筆的研究基金，希望經由學界的研究，上述的都市問題能夠被解決。與此同時，尤其是在1960年代中期及後期，美國聯邦政府改變以往的保守作風，大學進入都市問題領域，它提供了非常優渥的經費，政府企盼學術界不僅能夠幫忙訓練解決都市問題的人才，也能夠代替政府設計公共政策，並對公共政策執行狀況進行評估及建議。由於經費非常的充裕，大學裡許多規劃及都市研究的單位迅速的成立起來。因此，從某一個角度視之，這些研究單位的成立，其目的是為了能夠分享到聯邦政府的大筆經費。

由於那時美國在經濟及科技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在太空研究上的突破，更是讓美國人信心十足，相信都市問題將可輕易的解決，如果我們能夠轉移科技方法於都市問題上面。此外，在1960年後期，有一股追求社會及經濟公平的浪潮迅速在美國的社會中蔓延開來，面對發生於都市的多起暴動，一般人咸認大學及專科學校應該負有道義上的責任來幫助貧窮者及少數族裔。這種社會價值的轉變也同時對高等教育的結構提出批判，譬如：學生、教授、學校行政機關之間的階層式關係，及各科系壁壘分明的狀況都受到了嚴厲的指責。批判者也稱大學不應與社區脫節，他們認為經由教授及學生對於社區問題的研究，這種距離應該可以縮小。

此時，一個包含規劃及都市的跨科系研究就成為時代的新寵，人們寄望經由它能打破以往教育的藩籬，多培養出具有社會正義及公平概念的學生；也期盼這些研究能夠給少數族裔學生一個學習專業知識的機會，進而可以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因此，從1960年代中期及後期，大批的規劃者走進了社會，尤其是服務於政府部門，都市計劃也成為社會上所認可的專門業別，大量的就業機會等待規劃專業人員去填滿。回過來，由於就業市場需求鼎盛，這種現象又進一步的促成規劃及都市教育的成長。然而，好景不常，自從尼克森總統連任之後，受到了保守主義思潮的影響（Gordon 1977, 39），他開始凍結或是取銷聯邦政府有關於都市方面的計劃，這種舉動自然影響規劃教育的發展，而許多學者也在此時加強思考規劃及都市教育在學術界的定位及其未來的走向。

## 貳、規劃教育面對的問題及其回應

美國的規劃教育曾被批評為擁有不少的問題，然而學界也嚐試提出解決的方案，茲分別敘述如下：

### 一、規劃教育落後於政府的計劃，及通才與專才的問題

在過去，由於規劃教育內容甚為龐大，而且它往往是跟著政府的緊迫須要而來排訂新的課程，因此在時間倉促的情況下，教學單位往往是準備不及，致使所訓練出來的規劃者其品質堪慮，這種高速回應政府須要的作為，所造成的後果卻是犧牲掉了規劃教育的品質。然而，這項缺失卻也牽引出一個更值得思考的問題，那就是相對於政府部門，規劃教育扮演的僅是追隨者的角色，而不是居於領導者或創造者的地位。這一點是很多規劃學者急欲將之調整的地方，許多年來各個學校都花費許多時間及精力來發展幾個規劃研究的專精領域，期望經由這種努力，所訓練出來的規劃者能夠滿足政府或社會新的須求。經過長久以來的奮鬥及發展，已經有幾個專門研究重點 (concentrations) 為規劃學界所認同 (Patton and Reed 1988, vii - viii)：

#### (1) 土地利用規劃 (land use planning)

這是規劃學界裡歷史最悠久的一個研究重點，研究者關注於公平、有效率、及有秩序的進行土地發展，其主要的項目包含環境保護、成長管理、土地使用規則、休閒遊憩、生態均衡、及土地管理。

#### (2) 政策規劃及管理 (policy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這是規劃學界裡比較新的研究領域，主要的重點是要發展

公共政策來促成社會的變革，或是對現存的計劃進行有效的管理。由於政策規劃者往往是位居主要行政者的地位，他們面對的問題通常是種類繁多，凡是社會大眾所關注的幾乎全部包含在內。

### (3)交通規劃 (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研究的重點為人們及物品在都市區域內的流動，雖然交通規劃者偶而會規劃新的交通設施，但是他們的主要工作是要加強現有的聯絡網路，來促進地方上的須求（如經濟成長）、增加社會機會、及保護環境品質。

### (4)住宅及社區發展 ( housing and community planning)

這個領域的專家們分析各住宅區及其房屋的庫存量，以此來評定房屋的需要量及其不足數額。他們發展特別的策略來改良低於標準、過於擁擠、及成本太高的房屋或鄰里。這些專家們可能為政府工作，也有可能任職於銀行、不動產經紀商、或開發公司。

### (5)人類服務規劃 ( human services planning)

特別針對那些缺乏資源及機會的人，人類服務規劃者發展社會服務及健康方面的計劃，來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健康規劃者著重於醫療設施、儀器、及服務的提供。人類服務規劃者從事於住宅、人們精神上的健康、如何幫助吸食毒品者的再生、社會福利等。

### (6)歷史古蹟維護規劃 (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planning)

從事於這項專業的工作者，強調在規劃過程中文化及環境價值的重要性。他們對古蹟非常的重視，在都市及鄉村發展過程裡，運用規劃的技術於古蹟維護之中。

(7)經濟及資源開發規劃 ( economic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planning)

如何來提昇就業水準及工作所得是關注的重點，規劃者鎖定那些能夠促進成長及發展的公共政策，譬如：資訊、基本的公共設施、及教育。在資源開發規劃裡，經濟發展的目的必須配合自然資源的保育。

(8)環境政策規劃 ( environmental policy planning)

規劃者非常重視自然環境，並且關注於那些由人類社會製訂，卻會影響大自然的規則。他們發展、解釋、或管理那些能夠促進經濟水準的規定。他們專研於水的供給及其品質、固體廢棄物的管理、噪音消除、空氣品質、有毒物質及其廢棄物。

(9)國際發展規劃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規劃者審視不同的區域及國家發展策略，這包含了現代化及都市化的過程及問題、空間發展方式、成長中心及新市鎮、大都會規劃、比較國家都市發展政策等。從事於這項研究的規劃者可能調查低度開發國家的發展策略，及第三世界國家都市聚落的進化及發展。

(10)都市設計及實質規劃 ( urban design and physical planning)

建築工作者通常是從事於建築物的興建，而規劃者所研究的則是那些影響整個社區、城市、及區域的政策及計劃，若將二者整合則成為都市設計。從事於這項研究的規劃者不僅對實質設計感興趣，也欲從事於都市政策的制訂。他們的工作包含了實質細分計劃、老舊市區的更新、購物中心及新社區的規劃與建立等。

(11)電腦規劃 ( computer in planning)

逐漸地，電腦已被運用在規劃的各個領域，諸如敷地規劃及都市設計、資料庫的管理、電腦模型、及地理資訊系統等。在一些機構及公司裡，規劃者所從事的即為上述的電腦系統。可以預見的，電腦將被廣泛的運用在規劃之中。

上述這11個專門研究重點是介於通才訓練 (generalist training) 與專才訓練 (specialized training) 之間，寄望藉由這種規劃教育，其所培養出來的規劃者能具有高素質，也能免去了規劃教育緊隨政府須要的矛盾現象。幾十年來，許多著名的規劃學院都專注於少數幾個專門領域的研究，而柏洛夫及柯雷特認為這是規劃教育成熟的一面 (Perloff and Klett 1974, 170)。

## 二、發展出基本或核心的課程

在1970年代初，規劃教育受到了很大的挑戰，原因是規劃教育無所不包，課程內容非常的零亂，學者曾給予嚴厲的批評 (Wildavosky 1973)。面對上述雜亂無章的情況，少數大學進行研究，其重點即為如何凝聚共同的核心課程。經過了多年的努力，雖然各學校之間對於核心課程的認定仍存有差異，但基本上都同意以下三個重點：(1) 社會、經濟、空間、及政治之間的互動 (即都市系統如何運作及其變遷)；(2) 規劃理論；及(3) 規劃的方法，這包含了數量研究方法及研究設計 (Perloff and Klett 1974, 17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三項重點，除了第一項之外，並沒有固定的內涵，爭辯仍在繼續進行當中。

### (1) 實質空間與社會空間

上述第一項已獲得了相當的成果，規劃教育研究重點由以往的實質空間 (physical space) 轉變為社會空間 (social space)。根據 (Colquhoun 1991) 的解釋，所謂的社會空間即為

社會組織的空間意涵。以往規劃者過於重視於技術性的實質規劃，例如把社區內的土地分為住宅、商業、及工業使用，並增加社區內的公共設施，如圖書館、遊憩場、社區活動中心、道路等。其結果可能是一個規劃良好的社區，規劃者也因此覺得任務已盡，認為社區內的人們因此就能夠享受良好的生活。

然而，因斯 (Gans 1968, 1991)對這種僅重視實質規劃的情形頗不以為然，他由社會學的研究得知，人們所認為的好的生活可能是與實質的土地利用比較缺乏相關，反而，人們所認定的好的生活是與工作、所得、健康、家庭、鄰居、朋友等有相當大的關聯，好的生活也往往是與政治、社會、經濟、及空間有關。因此，他由此認定規劃者所作的實質規劃並不是達成好的生活的最重要要件。多年來，經過了上述對實質規劃的反思，許多學校不是減少他們對於實質規劃的重視，就是全盤放棄實質規劃，匹洛 (Pivo 1989, 26)指出，在許多都市及區域計劃的研究所裡，實質規劃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戴吉赫及史威惕 (Dagenhart and Sawicki 1992, 7)更指出由於規劃教育放棄傳統上侷限於實質規劃的定義，將研究的範疇從原本的實質空間擴大為社會空間，使得規劃在學術界上及大學裡佔有一席之地，並能與其它社會學科一樣的獲得尊重，成為一個特定的學科 (discipline)，而其研究的重點也提昇為公共政策的層面。

## (2)追尋規劃理論的典範

至於在規劃理論方面，雖然它已成為美國規劃教育中的一個重要學習科目，但是學者之間對於它的內涵卻也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由於受到了經濟及科技兩大思潮的大力衝擊，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不少規劃學者認為規劃教育應該是以訓練



技術人員 ( technician) 為主，至於那些與政治及社會有關的價值觀 ( political and social values) 則應該是儘量少去觸及，因為它們是無法經由規劃者所建立的模式來進行衡量 ( Harris 1960)。效率 ( efficiency) 成為規劃者工作時最重要的準繩，他們認為唯有如此才是理性的規劃 ( rational planning)。

麥爾森及邊費得 ( Meyerson and Banfield 1955, 314) 認為一個理性的規劃者在作政策決定時，將可以事前獲得所有的資訊，並且知道所有解決問題的途徑；此外，一個理性的規劃者也可以清楚的認知所有解決問題的途徑可能帶來的影響及後果；最後，一個理性的規劃者將可以根據他的價值判斷 ( 如效率 ) 來選擇最好的途徑。至於理性規劃者的主要任務則是要幫助市場的運作，因為在一個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市場對於都市設計及都市結構的影響是遠比政府還來的重要多了 ( Meyerson 1956)。

可是，許多學者對於上述這種傳統的理性規劃思潮卻迭有批評，並且提出了不同的規劃理論。最著名者如大衛道夫 ( Davidoff 1965)，他認為價值 ( value) 是無法從所謂的理性規劃中去除的，規劃者必須去探尋他所屬的價值觀，並為之倡導。他認為規劃者必須融入外在的政治環境，提倡政府及民間團體的共同利益；此外，大衛道夫特別重視公民在規劃過程的民主參與，他認為公民在公共政策的制訂過程中應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規劃的過程中不應把民衆排除在外。他主張政策的制訂通常是一種選擇，而不是事實的認定 ( a matter of choice, never of fact)，因此，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選擇的權力應該是保留在公民的手中，也唯有經由民主的參與才可以促進

理性目標的達成。他提出了倡導規劃 (advocacy planning) 的概念，建議規劃者必須幫助民衆參與，並應該特別協助那些無法參與的弱小團體，如低收入家庭。

著名的規劃學者弗立得曼 (Friedmann 1973) 也提出了接觸規劃理論 (transactive planning)，他指出規劃的工作往往僅是由技術人員來完成，具有專業技能的規劃者、與擁有生活經驗知識的被規劃者之間已經有了一條鴻溝，二者之間無法進行有效的溝通。面對於這種情勢，弗立得曼認為規劃者與被規劃者之間的關係必須作結構性的調整。他指出規劃者與規劃者之間必須多進行對話 (dialogue)，經由這種對話接觸，彼此將可以交換知識，進而互相學習 (mutual learning)，一起把知識轉化為行動。另外，高夫曼 (Kaufman 1978) 也提出了在公共政策的領域裡，規劃者就是介入者 (interventionist) 的觀點。在以往的理性規劃模式裡，專業規劃者所被賦與的角色是客觀中立的，對於公共政策僅是作出建議而不是介入。然而，在公共政策中，一個決策的制訂往往是一種社會選擇 (social choice)，規劃者應該要介入這種選擇的行動中。

此外，也有學者從激進觀點 (radical concept) 出發，對理性的規劃模式提出嚴厲的批評。葛羅布及漢斯金 (Grabow and Heskin 1973) 認為理性的規劃模式是權力集中、菁英式、及反對變遷的規劃形態；他們並大力批判理性規劃學者所堅持的科技 (technology) 及客觀 (objectivity) 的理念。他們要求徹底的更改這種規劃模式，將規劃的權力轉交給權力分散、並且能促進人們發展的社區社會。而俾爾理格 (Beauregard 1978) 也從類似的觀點來批評理性規劃模式，他認為規劃專家的專業

技能及追求效率的考量，在某一方面而言，是用來維持現有的權力結構及保障特權。他因此主張現有以科技專家爲主的意識形態，及規劃者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都必須作全面的重組。公平的考量必須取代效率，並且分配的正義也必須取代政府減少支出的目的。

另外，爲了追求一個民主的規劃過程，幫助民衆的直接參與，弗瑞斯德 (Forester 1982)繼大衛道夫提倡的倡導規劃之後，提出進步規劃 (progressive planning) 的理念。他借由路克斯 (Lukes 1974) 所述「權力三種面向」的觀念指出，在規劃的過程中資訊 (information) 往往因政治及經濟結構性因素而被扭曲，在這種情況下規劃者的主要任務即是避免這種情事的發生，讓民衆能夠接觸到正確的資訊，如此一來，民衆才能夠被賦予力量，真正的民主規劃過程才有可能達成。

上述不同規劃理論的爭辯仍在進行中，新的觀點也不斷的被引進，而各個規劃學院或科系在教授規劃理論時，也往往因不同的任教者而各有所偏 (Niebanck 1988)。因此，整體而言，在理性規劃理論之後，一個公認的規劃典範 (paradigm) 可能是還不存在的 (Alexander 1984)。

### (3) 量化或質化的研究方法？

規劃學門的研究方法是與整個社會學科的研究方法息息相關，由於受到行爲主義 (behavioralism) 的影響，許多理性規劃理論的支持者運用數量式 (quantitative) 的研究方法，他們也運用經濟學的概念，形塑了研究的數量模式。他們認爲事實 (fact) 是可以與價值 (value) 分開的，研究者所關注的應該是前者，而不是後者，也唯有如此，研究者的立場才是客觀中

立；也經由這種研究，一個純科學的學科才有可能被建立（Harris 1960）。

然而，上述的主張卻受到了許多的批評，如多爾（Dror 1967）就指出這種奠基於經濟理論的研究方式太過於倚賴量化，以致於無法來處理非量化的價值，把政治性的問題都忽略掉了。而且這種量化方式也缺乏考慮超理性因素（如創造力）的能力，沒有辦法來對付大及複雜的系統，也找不到辦法來考量個人的動機及其非理性行爲，因此多爾認爲倘若把這種分析方式應用在政治上的分析或公共政策的決定，其結果都是很值得懷疑的。

至於理性規劃理論支持者所經常運用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 - benefit analysis）也受到了很大的批評。本恩（Byrne 1987）指出政府的決策過程，將因成本效益分析的運用而有重大的變革。這個決策過程原本是由政治權力及利益所掌握的，但是成本效益分析的支持者認爲這樣子將會扭曲了資源，他們相信所謂的政府的管理是與政治無關，而是與政府的行政效率有關，這些支持者欲用成本效益分析來取代政治。本恩認爲政府的治理工作本來就是屬於政治的範疇，是屬於價值的選擇或意志的表現，它無法由技術性的效率考量來給與取代。

從1960年代開始，上述行爲主義的研究方式就不斷的遭受批評，契科（Chilcote 1981, 58）綜合了多位學者的意見，認爲研究者對於問題本質的探討應該優於技術面或工具性的研究；而事實（fact）與價值（value）是無法分開的，科學本身也並非是客觀中立的，至於價值的探討則必須與知識相聯結；所謂的知識份子必須對社會負有責任，必須來保護人類文化上的一些

價值，而不僅是作一個技術人員，與他們所要研究的問題毫不相干；同時，知識份子也必須融入每日的戰鬥中，參與專業知識的政治化，並且應用他們的知識來改造社會，至於量化的研究分析則應該改為質式研究（qualitative）。上述主張被稱之為後行為主義學派（postbehavioralism），已有許多規劃學者接受了這種立論。

### 參、新趨勢

如前所言，規劃學者經過長久以來的奮鬥努力，已經發展出幾個專門的研究重點（concentrations），而也因為對於社會空間的重視，使得規劃學術得以成爲一個學科（discipline），能夠在大學裡立足。然而，外在學術界的肯定並沒有停止規劃學術是否爲一個學科的辯論，許多規劃學者認爲應該將規劃學術視爲跨學門的學科（interdiscipline）才比較恰當。

康尼洛斯（Cullingworth 1970）就認爲規劃研究通常是以問題爲導向，而一個問題所牽涉的範圍向來是非常的廣泛，很不可能以一個學科來將其束縛，所以，規劃學門很不容易與其他學科畫定非常清楚的界限，而應該將其視爲一個跨學門的學科。康氏的論點得到了其他學者的認同，如理奇及華倫斯（Rich and Warren 1980）也持此立論，他們認爲規劃學門仍然不能將其視一個學科，以跨學門學科來對待它將是比較恰當的。以往有不少學者對於規劃是否能成爲一個學科頗爲擔憂，但是，布魯克斯（Brooks 1993），一位曾是很努力想要把規劃學術建立成一個學科的學者，在他審視過不同的規劃典範之後，卻很樂觀的認爲規劃學術的多樣性及充滿彈性是很值得慶

幸的事情，他並建議我們應該放棄把規劃學術建立成一個學科的追尋。另外，路斯 (Lucy 1994) 也持相同的見解，他並認為規劃學術的範疇應比以往還更加的擴大。

如果以此立場來看規劃學術，規劃教育除了是訓練規劃人員的專業技能之外，也應該要培養他們成爲一個通才。至於什麼是通才的內涵？借由伊盧 (Ellul 1964) 對於科技的認知，柏洛夫及柯雷特 (Perloff and Klett 1974) 指出，如果規劃教育過於重視專業訓練，很可能使得規劃者僅抱著技術不放，忽略了規劃過程中人的重要性，如此一來，規劃很有可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的後果。由於如此，規劃教育很有必要增加通才方面的訓練，而所謂的通才即是要加強規劃人員的人道關懷，探尋人的問題，及現今社會中的道德基礎。

而這一點與理奇及華倫斯 (Rich and Warren 1980) 的關點頗爲相近，他們認爲規劃教育應該多重視規範性 (normative) 的教導，(如公平與正義)，而未來規劃教育的重點應該是置於人民的民主治理 (governance)，即在公開及動態的都市系統裡，人民或團體能夠以民主方式來決定行動。他們說，如果我們把規劃教育放在這個大架構來思考，可以很清楚的發現以技術及效率爲主的專才訓練是不足夠的，我們應該多促進民衆、規劃專家、及行政官員之間的相互接觸，讓彼此能夠互相對話及學習。

其實，上述這種專一學門或跨學門、及專才或通才的省思，已隱隱約約的涉及規劃理論及研究方法的爭論。過去以技術及效率爲主的理性規劃模式已無法滿足時代的須要，多種規劃理論不斷地向它進行挑戰。在挑戰的行列中，弗立得曼

(Friedmann 1973) 提出的接觸規劃理論 (transactive planning) 最為顯著，而弗氏 (1993, 1994) 更在近年來建議規劃學界放棄以往技術性的規劃模式，邁向一個非歐幾里得式的規劃模式 (non-Euclidian mode of planning)，他除了依舊強調規劃應該是知識及行動的結合外，並提出了規劃的五項特點，那就是：規範性、創新性、政治性、接觸性、及社會學習性。由於公認的規劃理論典範目前是付之闕如，弗氏對於規劃的見解自然引來持不同觀點者的批評 (Alexander 1994)。除此之外，另有一股對現有規劃理論不滿的聲音正逐漸在擴大之中，所謂的女性主義由知識的認識論、方法論、規劃者所使用的言語等因素，要求規劃理論應吸納女性的訴求 (Sandercock and Forsyth 1992)。

如以孔恩的典範觀點視之，在理性規劃理論不再被奉為典範之後，規劃學術已經再回復到前典範階段 (preparadigmatic phase)，不同的理論將彼此競逐，欲稱雄於規劃研究的領域，而可以預見的是，規劃教育也將在這種爭論中向前邁進。面對於這種現象，我們或許該學習布魯克斯 (Brooks 1993) 的樂觀胸懷，以積極面來對待這個跨學門的學科，互相包容、學習及欣賞，也許經過這種接觸及對話，更能夠豐富規劃的研究領域。

## 參考文獻

- Alexander, Ernest R. 1984. After rationality, what?: A review of responses to paradigm breakdow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56:62 - 69.
1994. The non - Euclidean mode of planning: What is it to b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60:372 - 376.
- Beauregard, Robert A. Planning in an advanced capitalist state. In *Planning theory in the 1980's: A search for future directions*, eds. Robert W, Burchell and George Sternlieb, 235 - 254. New Brunswick, NJ: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 Blakely, Edward J. and Sumner M. Sharpe. 1993. Planners, heal thyselfes: Planning education, educators, and practitioners in the next centu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59: 139 - 140.
- Brooks, Michael P. 1993. A plethora of paradigm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59: 142 - 145.
- Byrne, John. 1987. Policy science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st - benefit analysis. In *Confronting values in policy analysis* 70 - 93.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 Chilcote, Ronald H. 1981.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search for a paradig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Colquhoun, A. 1991. Twentieth - century concepts of urban space. In *Modernity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ed. Colquhou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ullingworth, J.B. 1970. The politics of research, Centre for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d,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 Dagenhart, Richard and David Sawicki. 1992.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The divergence of two fields.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2:1 - 16
- Davidoff, Paul. 1965. Advocacy and pluralism in plann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ing* 31:331 - 338.
- Dror, Yehezkel. 1967. Policy analysts: A new professional role in government servi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7:197 - 203.
- Ellul, Jacques. 1964. *The technology society*. 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Inc.
- Forester, John. 1982. Planning in the face of pow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49:67 - 80.
- Friedmann, John. 1973. *Retracking American: A theory of transactive planning*. Garden City, NJ: Doubleday and Anchor.
1993. Toward a non - Euclidian mode of plann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59:482 -

485.

1994. The utility of non - Euclidian planning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60:377 - 379.

Gans, H.J. 1968. People and plans: Essays on urban problems and solutions. New York, NY:Basic Books.

1991. People, plans and policies: Essays on poverty, racism, and other national urban problem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ordon, David M. ed. 1977. Problems in political economy: An urban perspective 2nd ed. Lexington, MA: D.C. Heath and Company.

Grabow, Stephen and Allen Heskin. 1973. Foundations for a radical concept of plann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39:106 - 114.

Harris, Britton. Plan of projecti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use of models in plann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ing 26:265 - 272.

Kaufman, Jerome. 1978. The planner as interventionist in public policy issues. In Planning theory in the 1980's: A search for future directions, eds. Robert W, Burchell and George Sternlieb, 179 - 200. New Brunswick, NJ: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Kuhn, Thomas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ucy, William H. 1994. If planning includes too much,

- maybe it should include mo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60:305 - 318.
- Lukes, Steven.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Meyerson, Martin. 1956. Building the middle - range bridge for comprehensive plann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ing* 22:58 - 64.
- Meyerson, Martin and Edward Banfield. 1955. *Politics, planning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Glencoe: The Free Press.
- Niebanck Paul L. 1988. Planning education: Unleashing the fu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54:432 - 442.
- Patton, Carl V. and Kathleen Reed eds. 1988. *Guide to graduate education in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6th ed. Milwaukee,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Perloff, Harvey S. and Frank Klett. 1974. The evolution of planning education. In *Planning in America: Learning from turbulence*, ed. David R. Godschalk, 161 - 180. Washington D.C.: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 Pivo, Gary. 1989. Specializations, faculty interest, and courses in physical planning subjects at graduate planning schools.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9:19 - 27.
- Rich, Daniel and Robert Warren. 1980. *The intellectual future*

of urban affairs: Theoretical, normative and organizational options.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7:53 - 66.

Sandrock, Leonie and Ann Forsyth. 1992. A gender agenda: New directions for planning theo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58:49 - 59.

Susskind, Lawrence E. Prepa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planne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57:20 - 21.

Wildavosky, Aaron. 1973. If planning is everything, maybe it's nothing. *Policy Science* 4:127 - 153.